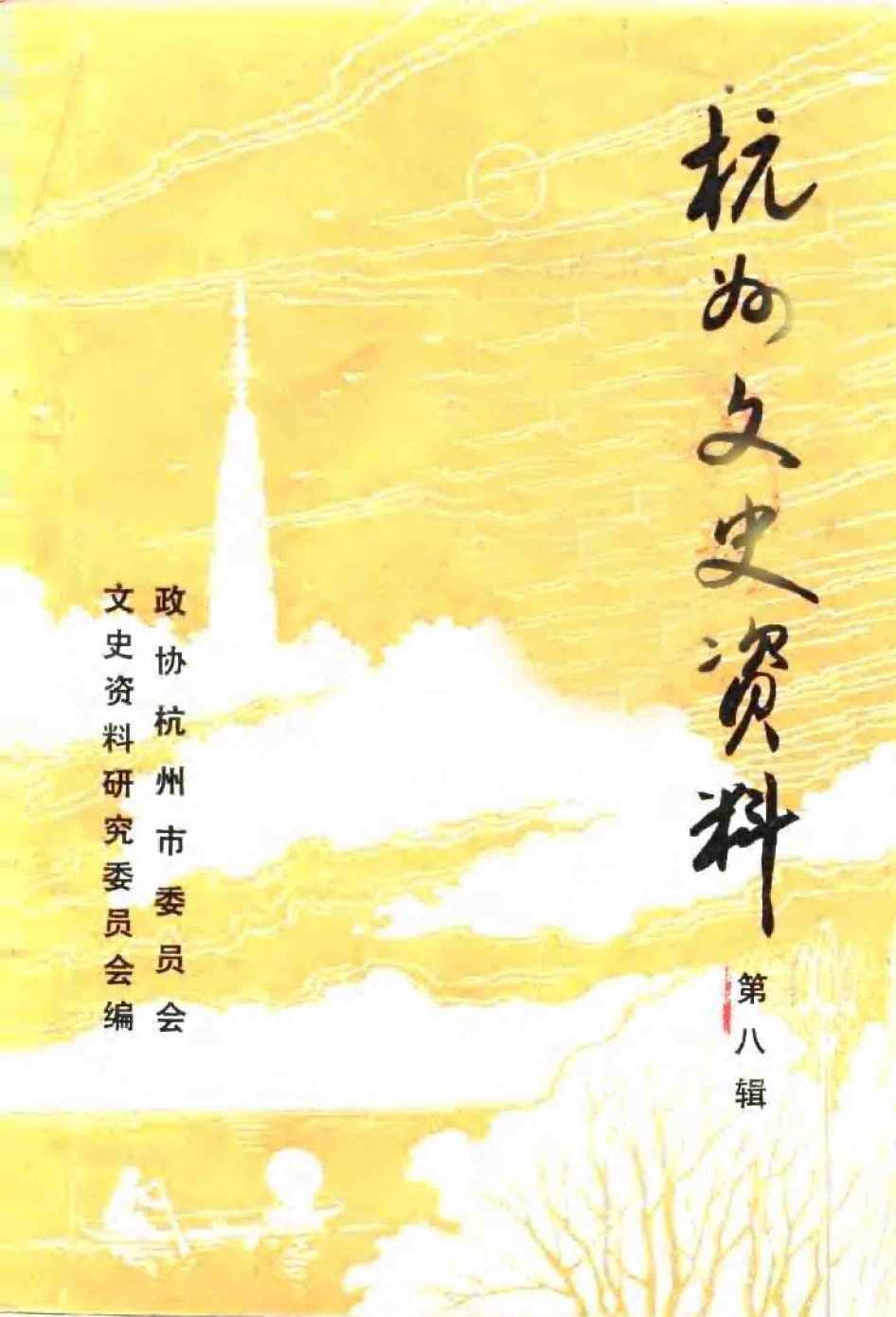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杭州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政协杭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会编

杭州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(内部资料)

政协杭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87年3月

目 录

马寅初先生二、三事·····	沈松林 (1)
王平夷同志在金华·····	储 蔚 (4)
热心中医教育的傅爨园先生·····	傅奉钦 (9)
汤士彦中医师·····	张嘉因 汤小彦 (12)

1946年杭州市的“国大”代表选举·····	黄丽生 (15)
昙花一现的浙沪禁烟公署·····	韩承瑜 (18)
国民党杭州青年劳动服务团·····	汪坚心 (21)
解放前发生在杭州的一次军警冲突·····	沈 颐 (23)
解放前夕杭州几个政警头目的去向·····	倪觉生 (25)
痛歼日军“木更津航空队”侧记·····	曹觉迟 (29)
抗日战争前日本人在拱宸桥·····	钟韵玉 (39)

省立杭初五十年 (1899—1949) ·····	倪连德 (43)
两浙盐务中学·····	鲍祖宣 (57)
三十年代杭州的话剧团体“艺专剧社” ·····	邱 玺 (61)
杭州滩簧·····	王与昌 (69)
杭州早期文艺报刊·····	钟韵玉 (81)
杭州记者公会和杭州作者协会·····	赵彰泰 (85)

✓ 杭州基督教学生公社……………陈维新 (89)
✓ 杭州学生救济委员会……………陈维新 (97)
余杭县归侨合作农场……………余杭县侨联 (104)

杭州自来水厂创办前后……………李 通 (112)
五十年前的杭州会计师事业……………韩祖德 (120)

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提纲
…………… (125)
作者、读者、编者…………… (130)

马寅初先生二、三事

沈 松 林

马寅初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。后来与他也经常接触，受其教导，前前后后达二十多年，在我脑海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，兹择述于后。

（一）抗战前，他在南京工作时，他经常在星期六从南京回杭州，下星期一坐夜车赴南京。我有时送他上火车，总看到他手挟一本厚厚的书（英文版的多）。我曾问他：“马老师，你坐夜车还要看书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来去火车中看看书，已成习惯。我是走马看花，把其中要点划上线，以后需用时，随时可查。”我接着说：“您早成著名学者，快成老年人了，还要这样用功吗？”他严肃地回答说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更要加紧吸收新知识，如一旦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经济事件，别人问我是怎样的看法，有什么意见，我若答不出，岂不是把我这个所谓‘经济学家’的招牌打碎了吗？”他又接着说：“任何人研究学问都要精益求精，一旦自满就会被时代淘汰。”他讲这些话确有条理。当时我国货币是用“银本位制”的，在西方金融市场发生波动时，一般都在我国半夜里，一到天亮，就有银行家、工商业界人士、新闻记者和财政经济有关人士赶到马先生家中询问：“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？我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和措施？”马先生总是胸有成竹，仔细地分析问题，提出看法以及应有的对策等等，

在报刊上发表，供人们采用和参考（有时国内外政府改变经济政策，尤其发行新货币时，也会有人去问他）。

马先生还主持“中国经济学社”。杭州保俶塔旁有座洋房是社址所在，他时常去讲学。在杭州夏季高温时候，他晨赴灵隐，傍晚才进城回家，每次总是挟着书包，找个幽静环境，阅读书报，研究问题。

（二）抗战结束，我先返杭，马先生不久也回来了。我急去法院路他家，师生再见面了，我却忍不住而流泪，但他精神饱满，谈笑风生。1946年，我脱离行政界，到浙江省银行（即浙江省地方银行）经济研究室工作，准备编辑《浙江经济》月刊和《浙江经济年鉴》。马先生看到我拟的初步计划时，他对内容、体例和组稿等方面都详作指示。以后每期月刊定稿时，我常先送请他核阅后再付印。《浙江经济年鉴》是集合当时三十几个单位人员合作编写的，马先生在百忙中仔细看过原稿。出版后，他很高兴，说：“为浙江近代经济史留下一份宝贵的资料。”

（三）解放前夕，马先生说要离开杭州，虽未说明向何处去，但我心中有数，知道他是去北方解放区。1949年5月3日，杭州解放了。三天后，马先生以华东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回到杭州。他问我：“宝麟呢？”我说：“他走了！”他说：“为什么要走？你想办法通知他回来。”我又说：“他也许与民政厅长阮毅成一道走的，现在何处不清楚，无法通知的”。（陈宝麟是当时的财政厅长，原是马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得意门生，北伐后通过浙江省第一届县长考试，从县长逐步升为财政厅长）杭州解放十多天后，接管浙江的党代表汪道涵将浙江省银行经济

研究室人员、刊物、资料与图书等全部调入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（主委是张劲夫）。我告诉马先生。他严肃地教导我：“建国之初，百废待举，你要尽力为人民办事，藉赎前愆。”后来马先生调当浙江大学校长，我曾冒昧要求他让我到浙江大学工作，他只说：“一切应听人民政府安排。”他调任北京大学校长后，我就无缘再受他的教诲了。

（四）抗战前，马先生由南京回杭州，有事停留在上海，要过宿，就去国际饭店开房间。账房请他填《旅客登记表》。账房看后，竟眉头一皱说：“对不住，我们没有空房间了。”马先生呆了一下说：“好好，我借打个电话。”账房用手一指：“电话就在电梯旁边。”马先生打好电话，就坐在会客室内埋头看书。不到二十分钟，门外汽车喇叭响，账房慌张地赶出去迎接。下汽车的人大声问：

“马博士住在几楼？”账房答：“没有马博士。”“胡话，他刚刚打电话给我。”账房急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呵，呵，有个嵊县人姓马的来问过一声，已走了。”“混帐！”那个人神气十足，走过会客室前一看：“哎呀！马博士，您怎么坐在这里？”马先生抬头微笑说：“新之兄，你们饭店没有空房间呵！”“对不住，我向您道歉，快上楼。”那位新之兄，就是国际饭店的创办人，国内有名的“小四行”的董事长钱永铭，也是当时上海滩上头号人物。他事后痛斥那个账房说：“你只知道嵊县人有当绑匪的，却不知道嵊县有位举世闻名的马寅初博士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！”马先生回杭州后，对我们讲起这一事时，大家觉得这位老教授还有这样的幽默风趣，不禁为之捧腹。

王平夷同志在金华

储 蔚

1938年初冬的一天，我到金华酒坊巷十六号《浙江潮》周刊社去，与编辑翟毅同志联系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的工作。这时，认识了一位身着蓝布长衫，身材魁伟的青年编辑，他就是王平夷同志。

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以后，南京、上海、杭州相继沦陷，金华这个古老的城市，成为我国东南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各地爱国青年络绎不绝来此，抗日救亡运动在金华蓬勃发展。不少老革命家、作家和知名进步人士，都曾经在金华领导过抗日救亡工作。王平夷同志很早就在这里，团结各界人士，积极参加党领导的“浙江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”的工作。

1938年3月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，办起了《浙江潮》周刊，由黄的秘书严北溟负责主编。王平夷同志接受党的指示，以公开身份出任该刊编辑，组织并撰写稿件。在社论和专论中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，正确剖析抗日战争形势，严厉驳斥投降顽固派散布的“抗日必败”和“唯武器论”等悲观论调，摆出事实，阐明抗战必胜的道理，鼓舞群众，动员群众奋起抗日。同时，他和老战友翟毅同志（中共金华县委书记）密切配合，致力于发展地下党活动，忠诚地为党工作。

在白色恐怖统治下，《浙江潮》的工作人员，大部分是地下党员。因此，这个周刊的实际工作，都是党员做的。主编严北溟，在社会上有声望，又是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秘书，许多党员，都由严北溟同志掩护。在严北溟同志的卧室里，他可以毫不在意地在床上摊着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但是年青的王平夷同志等，却不能如此。在王平夷、翟毅同志的房间里，别人丝毫也觉察不出有什么革命文件和红色书籍，隐藏得很好。

《浙江潮》周刊既要宣传抗日，指导抗日，又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王平夷同志责任很重，但他愿多承担一些编辑工作，让翟毅同志有时间去领导全县党的工作。所以他常常日以继夜埋头编写整理稿件，艰苦工作，并且十分谨慎细致。稿件力求表达思想论点的正确；文字上，认真推敲，免得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。

王平夷同志写的文章，爱用“平夷”为笔名。翟毅同志用“翟林楚”、“林初”的笔名。张文岑同志则用“张闻岑”为笔名。由于王平夷同志和大家一起努力，《浙江潮》发行到东南各省，对坚持和推动抗日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王平夷同志很关心对年轻同志的培养。浙江省儿童保育会的林心萍（女），中华全国基督教军人服务部刘良模同志领导下的男女同志，常向王平夷同志谈工作，向他请教。王平夷同志总是热情地给予启发指导，并秘密地将《解放》周刊和马列著作交给他们阅读，引导他们自觉地接受革命思想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。许多接近王平夷同志的年轻人，都非常敬重他。那时候，我虽然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，但是心中却肯定王平夷是个共产党员。我也渴

望有一天成为一个共产党员。果然在1939年2月18日上午，翟毅同志在房里将一张入党志愿书交给我填写，并且告诉我：“入党介绍人是我和王平夷同志。”从此，我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1939年初，王平夷同志分给我的工作，是誊写原稿和校对稿件。我们俩在他的卧室工作。我见他总是全神贯注，专心处理稿件，他除了对我指点以外，不讲一句话。

王平夷、翟毅同志，还不时抓住时机，进行公开活动。1939年初，新华社战地特派记者石西民同志来到金华，王平夷、翟毅同志抓住机会，积极准备，赶紧通知新闻界、文化界和各抗日人民团体的同志，在《浙江潮》社大厅里，召开欢迎大会，邀请石西民同志作“抗日形势”报告。使金华各界人士听到共产党记者的讲话，认清抗日形势，坚定抗日必胜信心，极大地鼓舞了人心。

《浙江潮》社还经常召开座谈会。1939年春，国民党中的投降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，查封了出售进步书籍的新知书店和生活书店，并禁止进步刊物出版；另一方面，却在浙东大量翻印周佛海（不久就投降日寇，做了大汉奸）著的歪曲孙中山先生的《三民主义》，宣扬反动的唯生论的《三民主义概论》，以及托派叶青的反共书籍。针对这些情况，王平夷、翟毅同志特地召开座谈会，邀请各界人士参加，专题座谈“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”。会上明确提出了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。发言的同志一致认为：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，必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。要争取抗日胜利，就必须动员群众，组织群众，那就要实行民权主

义，发扬民主，才能发动群众，全民抗日。同时还要实行民生主义，就是要改善人民生活。这样，才能使群众动员起来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。这就是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的关系，缺一不可。

这次座谈会，既从正面阐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与抗日的关系，又向国民党提出必须坚持抗日，发扬民主，改善人民生活的合理要求，并促使国民党抗日。

省政府主席黄绍竑，为要发展浙江的抗日武装，已经建立了八个支队，还有各县的自卫大队。黄绍竑是桂系的，与蒋介石有矛盾，他怕蒋介石派嫡系的军官来控制浙江的地方武装，就以浙江省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的名义，在金华办了军官教导总队，培养地方武装军官。为了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，争取抗日力量，1939年夏天，王平夷同志接受党的指示，离开了《浙江潮》社，以中校政治教官的公开身份，打入浙江省军官教导总队去工作。

王平夷同志在讲课中，首先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，武装这些军官的头脑。还讲述游击战争理论，来争取抗日力量。并且还掩护地下党同志进行党的活动。

浙江军官教导队结束后，王平夷同志又奉上级指示，转到义乌县，以义乌县政府秘书兼军事科长的公开身份进行革命活动。王平夷同志和县长吴山民、教育科长吴世雅等密切合作，义乌地下党得到掩护，党的工作开展得很好。同时，翟毅、王平夷同志等，还安排不少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义乌工作。那时义乌政工队长龚绍达，王行之，队员李修业，县民教馆长徐彭龄，馆员吴立基，培磊民教馆长沈士达、馆员储蔚，都是地下党员。当然还有更多的人，义

乌的抗日救国工作，搞得轰轰烈烈。

当时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，义乌的形势险恶，王平夷同志等为避免革命力量的损失，先疏散年轻的同志。1940年1月初，王平夷同志写了介绍信，委托李益中同志把我转移到浙西天目山，让我在中共浙西特委兼宣传部长贺千秋同志领导下进行活动。他还把进步青年李鹤尧（后来入党）、季秋琴（女，后来入党）也介绍到了浙西。李鹤尧和我加入浙西行署少年营，有了公开身份，季秋琴参加了浙西行署妇女营，进行抗日工作。

王平夷同志早年在燕京大学预科读书，1936年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学生运动，对他影响极大。为了救国，他毅然离开课堂，奔赴陕北公学学习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他到了浙江金华，由翟毅同志介绍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热心中医教育的傅懒园

傅 奉 钦

先父傅懒园名崇猷，字篴笙，以号名世。1862年生于浙江绍兴，1931年病逝杭州。一生尽瘁医教。七岁能赋诗，嗜医书，善琴、棋、书、画，尤工墨梅。幼习举子业，为清末举人，官为教谕。鼎革之后，不求闻达，弃官从医，致力岐黄，旨在救民疾苦。精于内、儿、妇科，悬壶大江南北，颇多效验，而获盛名。生平著作甚多，现可查者有《懒园医话》、《众难学讲义》、《懒园医语录》、《懒园医案选》、《医学诗文》、《画梅辨难》、《懒园梅册》共四、五十卷。

先父以为，欲振兴祖国医学，若只凭家技相传，不开办中医学校，则无法造就大批后继人才。在求医者接踵，诊务繁忙中，撰写了《振兴中医药之刍议》，提出开办中医学校，创立医院，发掘人才等八项建议。他说：“学校为造就人才唯一之机关，国家之强弱，学术之进化，莫不唯教是赖；吾中国数千年来，无所谓学校（中医学校），若仲景、华佗之神术，当时苟有学校以教授学生，列代相传勿失，则吾中华之学术，虽至今日，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。今欲振兴医药，非速召集医界大众，办医药学校，造

就医药人才不可。”基于这一认识，他身体力行，捐献家蓄、房产，并奔走多方，联络医界仁人志士，并蒙有识之士资助，终于在1915年在杭州正式创办了“浙江中医专门学校”，并出任校长。开校典礼时，亲题一联云：“纵观二千年历史，岐黄坠绪，若绝若存，续旧学以辟新知，问此职何人克任？横览四百兆同胞，疾病疮痍，待拯待救，出病苦而登寿域，舍吾党小子其谁？”倾吐出奋勇办学，忧民为国之肺腑衷言，激励学生，认清要任，发奋学习。开学之后，设计课程，自编教材，亲自授课。其时先父已年过半百，但仍不辞辛劳，知难而进，对学生进行创新与医教结合的业务培养。课程设计，本着“续旧学以辟新知”的精神，以经典中医之内科、外科、儿科、妇科等为主，大胆辟新，开设了解剖学、生理学、病理学等。为了培养学以致用用的中医学人才，办学校必须兼办医院，就在杭州开办了两处施医所（后改为诊疗所），准备创办医院，为学生建立实习基地。先父极重视医德教育，常谆谆教导学生要以孙思邈、庞安时等医德高超的医学家为榜样：“孙在公立志济人度世，庞安时存心乐义轻财，华元化以矜老恤孤为宗旨，喻嘉言以救贫济急为本心，所以姚蒙却酬金，重德不重利；梦奠重心地，可敬亦可师。前贤俱在，愿诸生效之。”先父身教重于言教，救民疾苦，即使家境拮据，仍对贫病者施诊施药，对贫寒者施衣施粥。家父虽为江南名医，然虚怀若谷，诲人不倦。在毕业学生训词中，他说：

“医术之优劣，在实地经验，不在弋获虚名。医生之天职，是保社会之健康，不是谋一人之私利。”一再告诫学生，不学庸医之所为。先父执教十五年，桃李遍大江南

北，其高足弟子，大都成为德才兼优之名医。

先父创办医校，开设医院，旨在振兴中华医学。他提出淘汰庸医，对业医者进行考试的建议。他说：“考试不可限题，任其将生平最优之学术，自作讲义，不拘门例多少，试笔合格后再入医院，实行试验；若与其所说相符即确为有学术，有经验之医学，呈请行政给凭，准其悬牌。”并主张对医药界有卓越贡献者，给予奖励，以促进学术之进步。

先父一生，“富贵于我似浮云，名利于我如清风”。在晚年曾赋诗云：“满园桃李手亲栽，和煦光阴腕底来，老干逢春先发轂，百花步我后尘回。”

汤士彦中医师

张嘉因 汤小彦

汤士彦，字泓，乳名阿妥，出生于1902年，杭州市人。农工民主党成员。系世医外科施容川先生的得意门生。施容川原在惠民病院任外科医生（院址在今胜利小学，惠民病院前身系同善堂）。施先生有一名学徒，是孔凤春香粉店店主之子，因患肺病去世。当时外科业务繁忙，乏人配药摊膏药，因而多方物色，最后选中汤士彦，收为学徒。汤家境清贫，得到施容川青睐，深感荣幸，故工作勤奋，专心攻读。满师后留同善堂任外科医师，除搞业务外，还做些中医会务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。后受聘任“三三医院”为内科医师，得名医裘吉生先生的提携，在裘的帮助和支持下，担任中医师公会的职务。

汤士彦医师医术高明，精通内、妇、儿科，尤以外科见长。为人沉毅果断，勇于任事，待人接物更具热忱。凡遇医界业务纠纷，辄能主持公道，故极得同道之赞许。

1928年中医药遭到排斥，有被消灭的危险。全国各地中医同声抗议。裘吉生与他均被推为杭州代表去沪参加会议，并赴京请愿。风尘仆仆，不遗余力。为争取保存中医中药，发扬祖国医药遗产辛劳奔走。

1937年12月，杭州为日寇所陷，汤士彦不愿在

铁蹄下生活，避难淳安行医。

1945年抗战胜利，汤士彦返回杭州。向杭州市卫生局申请开业执照。卫生局在所发的执照上加盖“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，违则吊销执照，取消资格”字样。汤医师认为这是限制和侮辱中医的表现，撰文表示强烈抗议。该文刊登在1946年1月13日《东南日报》第一版上。此举震动官方，被迫取消加盖限制图章。中医医师扬眉吐气，因此博得全国中医医师的赞扬。

解放以后，汤士彦医师响应党“组织起来”的号召，带头组成杭州市第一所中医联合诊所——同济诊所。

1956年汤医师调市三医院任中医科主任。他不管门诊业务多忙，急诊、会诊病人众多，从无倦意；在繁忙工作中仍挤时间备课教学，带教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和实习生。还结合临床搞科研工作。他以院为家，日以续夜。

1964年汤医师已年逾花甲，且患有高血压、冠心病，但他仍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，第一批报名去农村巡回医疗。1966年春，正拟订好老中医带徒传授技术的规划，和准备总结五十年临床经验以留后人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因而未能如愿以偿。在“文革”中，他遭受迫害。

1971年汤医师被迫退休。1976年8月患膀胱癌住院治疗；1977年2月4日医治无效病逝。1982年12月1日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。

汤士彦医师解放前历任浙、闽考铨处中医医师检核委员，浙江省中医医师公会理事长，杭州六通中医疗养院医务顾问，杭州市佛教会施医主任，《中国医药研究》月刊社